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研究Ⅱ

Studies on Western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II

王 元

東北文化学園大学 経営法学論集 第1巻 第1号 (2022年3月発行) 別冊

Business and Law Studies Vol.1, No.1 March 2022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研究 II ¹⁾

王 元 *

Studies on Western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II

WANG, Yuan

论文提要

论文题目：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研究

正文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即论文的第一、二两章，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进行客观介绍。第一章概述了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政治发展理论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和地位。它产生的历史、社会和思想背景。第二章综述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内容，主要是按照研究领域把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划分成七大块分别予以介绍。七大块是：概念定义、过渡政治、政治文化、政治稳定、政治民主、政治社会化和政治现代化。这七大块不见得能够兼容并包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全貌，笔者尽量把余下的内容

* 东北化学圈大学経営法学部教授

1) 这篇论文是我1988年在复旦大学申请硕士学位用的论文的后半(第五、六两章)。33年前的论文是不成熟的，现在回头来看看对自己当年的一些看法也不尽以为然。之所以把在这里发表出来主要的目的有三：首先，是为了纪念当年的指导老师王邦佐。王邦佐老师于2021年8月过世了，作为早期弟子我曾经深受先生的教诲，但却因为新冠肆虐未能回国参加各种追悼活动，这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遗憾。第二，最近世界各国都在总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迅速崛起的经验教训，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思维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始追踪新中国的政治学研究的历程。从本文可以看出，从一开始起，我们就并非只是简单地引进了西方的政治学术。第三，写论文的时候，我已确定留校，课题也是系里指派的。前半很快就公开发表了(夏征农主编《西方学术思潮论丛》学林出版社1989年11月)，但是我执笔时更加用心的还是这没有公开发表的后半。考虑到以上三点，这次发表基本上维持了论文的原来的样子，省去了对当代西方著名的政治发展理论家的介绍(附录II)和参考书目。

也放进七大块中与之较为相近的一块中去，以求全面。

这一部分的任务在于客观介绍。笔者主要是从有关的资料中把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论点摘抄下来，加以整饬和排列组合。这一部分基本上不反映笔者的主观分析。

第二部外即论文的第三、四两章。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进行分析评论。第三章分析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理论成就和贡献，在指出其四个方面的成就贡献的同时，笔者还特意指出这些成就与贡献对中国政治发展和中国政治理论的发展可能具有的启发意义，即从中国的观点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可资继续发展深化的方向。第四章则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缺点错误，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如要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必须吸取的教训。

这一部分从内容上讲是本文的重心所在。尤其是第四章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缺点错误的分析，篇用了较大的篇幅，内容多，态度也很严峻。笔者之所以作这种处理，主点是为了纠往过正，以期弥补一下迄今为止国内介绍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负方面的不足。这一部分既有客观介绍又有主观评论。

第三部分，即论文的第五章。在这一部分里，笔者联系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概述了自己对吸收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客观合理之处以改造我们传统政治发展观的一些看法。这一部分点出了本文写作的旨趣和核要。

另有两个简短的附录：一是为配合第四章的分析而进行的对美国政治发展理论大师派伊关于过渡政治过程7项特征进行的定量分析。另一是对当代西方几位最负盛名的政治发展理论家的介绍。

政治发展理论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ory) 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研究政治系统内的各种变化以及系统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变迁。政治发展理论本世纪1960年代在美国兴起，很快风行整个西方政治学界。如今是目前西方政治学中最热门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之一。

新中国自1980年代初恢复政治学研究以来逐渐加强对西方政治学的介绍工作，政治发展理论也随之为我国学界所了解。由于政治发展理论以政治系统的变化发展为研究课题，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就跟我们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改革（包括制度的，体制的和精神的各方面）之间具有某种不期然的关联性，而这也正是目前国内学界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刮目相待的主要原因。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和发展事业很可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但总的说来，迄今为止，国内有关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介绍工

作并未系统全面地展开。我们已有的介绍大多限于“客观介绍”，而绝少客观分析，更缺少与我们国家自己的政治观念、政治状况对照起来进行的分析。笔者不敏，希望能在这篇论文中阐述几点自己对于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分析和研究结论，以期对上述不够周全的介绍工作多少有所补正。

理应在导言中首先予以说明的一点是，本文既以对国内已有的介绍和研究工作有所“补正”为重心，则本文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与这种工作不大一致，甚至与之背道而驰的。本文以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商榷、指责和批评性分析为主。但是，另一方面，本文全篇的内在逻辑却并不在于批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而在于通过这种批判以改造利用之，以促进我们国家目前的政治改革和我们民族迫切需要的新政治发展观的产生。

一九八八年三月底

第四章 理论缺陷

§ 15 “西方中心论”倾向

阿尔蒙德在谈到文化世俗化时曾倾向于认为，文化的世俗化应该是有多种形式的，在各种形式之间应该只有量的区别而没有质的不同²⁾，因为每一种形式都能给政治体系带来必要的“适应态”。在这里，阿尔蒙德力图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他反对无视西方以外其它形式的文化世俗化，他认为只要多种形式的世俗化所导致的政治精神、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分化的程度能赶得上西方政治，则它就同样有价值，同样能达到文化世俗化的目的。

应该承认，阿尔蒙德此处所表露出来的主观态度在整个当代西方政治学界是颇具代表意义的。派伊也曾强调政治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与动力价值。在派伊看来，政治现代化的成功与否基本上取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能否很好地互相融合为一体。达尔的多元分析更是主动地采取了一种二元的标准，以求尽可能全面地把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政治体系）的特殊性都反映到他的分析框架中来³⁾。

2) 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第一章。

3) 达尔《多元政治：参与和反对》第十二章。

然而，令人非常遗憾的却是，尽管看着如此谨慎小心地努力，文化差异不可避免地带来的恶果，文化偏见和文化色盲—西方中心论还是或隐或显地出现在发展政治理论的各个领域之中，尤其是那些必须采用硬性定量标准加以衡量的领域。一般而言，“西方中心论”倾向在政治发展理论中的表现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1. 过份地强调了一些传统的西方政治价值观念

如自由、平等、权利、民主等等。无视这些要求在西方的政治发展中实际上是作为后果而非作为前提存在的。达到这些标准需要长期的曲折发展。因此要求落后国家一开始就在这些标准上完全合格是不切实际的。落后国家的一些实际问题，发展基础的薄弱，发展速度的迅速（要求在短时期内完成别国长期完成的发展任务），应该说这些是更值得重视的发展问题，各种西方发达政治体系所特有的发展标准，如经济指标结构分化、文化世俗化等等，不一定适合世界上一切政治体系的发展。

2. 对革命、危机、动荡等所谓“异常”的、跳跃性的政治发展持偏见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无视在西方实际上也只有英国的政治现代化道路较为平坦的事实，不顾几乎其它所有的西方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都曾有过剧烈的动荡，危机和革命的事实⁴⁾，一味鼓吹保守渐进和改良的政治发展战略，有的甚至不惜引用中国古代的所谓“托古改制”作为自己政治发展理论的口号。⁵⁾由于文化偏见的作怪，许多政治发展理论家不愿对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作过程的比较，而只懒省事地作后果性比较，即不比较各国在达到今天这种水平的发展过程中分别都投入和付出了什么，经历过何种痛苦不幸和挫折失败。⁶⁾而只对它们最后取得的成就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是无法深入的。

3. 美国中心论

实际上，西方中心论又是以美国中心论为依托的。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繁荣

4) 美国、法国有内战和资产阶级大革命；德国、日本、意大利则发动过对外侵略战争；俄国则有扩张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5) 如作为汉学家的派伊。

6)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大量有关的论据，资本主义国家有今天都是付出了代价的。

昌盛的典型，美国是政治发展理论的发祥地。所以绝大多数政治发展理论家言必称美国，把美国政治当作衡量一切政治发展的标准和模范。但真正说来，美国作为一个政治上比较民主，进步和发达的国家，它的发展方式的确具有供其它国家借鉴、参考的价值。但把这个标准绝对化，把不发展的标准也由它反推出来，就未必合情合理了。这一点我在前文的分析中已经指出过了。

4. 忽视民族主义在政治发展中的巨大推动力量

看不见民族意识作为特定政治发展阶段的产物所具有的存在合理性与必然性。它作为落后国家所能够依靠的为数不多的发展动力之一。而且实际上西方国家的发展亦何尝不曾得益于民族主义甚多。⁷⁾ 民族主义往往能给政治发展带来动力和生机，并不总是落后、愚昧、保守和丧送政治发展前程的东西。

5. 忽视发展作为全人类各种政治体系面临的共同课题

这也使得政治发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囿于区域性和阶段性的有限范围，而不能将它真正上升到全人类政治的普遍意义上去。不仅如此，它还使得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大有失之简单的嫌疑：对西方国家不存在政治精神的问题，而东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又不过是重复西方走过的道路而已。

为了确切地指出政治发展理论中的“西方中心论”倾向，我用图表解析和定量分析的手段时派伊关于过渡政治过程的十七项特征进行了一个有趣的分析，参见本文附录 I。

§ 16 价值困境

“西方中心论”倾向给政治发展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视野上的狭窄，使得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们在价值问题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亨廷顿曾一再强调落后文化和东方文化固有的价值，以期弥补他们在这方面的疏忽。阿尔蒙德亦曾扬言：“在我们看来，要解决隐含在选择问题和观察角度中的价值倾向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正视所有类型的政治价值。”⁸⁾ 阿尔蒙德是在自己的理论受人非议，被指责为“倾向于稳定和秩序的价值……重视民主过程而忽视了其它（政治）产

7) 给西方政治发展以极大推动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即是两种极端恶化了的民族主义。

8) 阿尔蒙德上书，第27页。

品”⁹⁾以后说这句话的。由此可见，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对自己视野的狭窄有所醒悟，主观上是在努力纠正的。但即便如此，他们的努力并不十分成功。

由于受到“价值祛除”口号的影响，政治发展理论未能如愿以偿地从哲学的高度探究政治发展。政治发展理论家们解决不了发展的价值究竟何在这个问题。他们往往囿于具体的政治发展战略策略响题，但却从来无法把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起来，而只能在各种特殊性之间纠缠不清。一方面，当他们讨论过渡，谈论进步的时候，他们会很自然地把现代西方政治当作发展方向和目标，而不问西方政治发展实际上也不过是一般人类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方面，一个分支而已；另一方面，当他们受到指责，认识到以西方为准的做法具有很大的偏狭性时，他们又会转而大肆吹捧落后的，传统的政治价值观以及所谓的落伍者的权利等等，从而置各种特定的人类政治体系都有追求更大进步发展和更高的存在形式这一普遍规律于不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是，西方政治发展观一直还很难与其它远较“纯粹”的价值体系相对抗，它只能改改变象太平洋里几个偏僻小岛上只有初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人民，而对那种已经确立起多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古老民族它总显得软弱无力。

政治发展理论没有说明，在合理的稳定、秩序、生存这些价值之外，人类政治的发展何以还会具有如同东方古老民族的那些同样合理的价值¹⁰⁾，一句话，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量级”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同样的道理，由于没能真正从价值高度俯瞰人类政治发展的进程，政治发展理论缺乏对政治发展内在动机和一般机制、机理的讨论。许多理论家都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政治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它又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的原因。虽然政治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交互影响，但从历史上看，政治发展往往成为更大规模的现代化过程的中心环节。例如，第一批现代化的英国等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政治起了一种推动作用；第二批的法国、德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的作用更重要。至于第三批现代化的日、俄等国，政治的作用更是占据了主导地位。

一般的理论家，如派伊和亨廷顿都用这种现象论证了政治因素在现代化过程

9) 阿尔蒙德上书，第27页。

10) 譬如伊斯兰 - 阿拉伯的政治观，再如中国道家的政治观和印度教的政治观。它们都并不主张积极主动地向前“发展”。

中的重要性，但却都不曾从中挖掘出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法则和一般规律。由于缺乏这种对发展内在动机和一般机制的讨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一般总也看不到真正适合于落后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和手段，因而对革命、暴力、民族主义、动荡等等现象一律持否定的和厌恶的态度，看不到它们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同样的原因也使得政治发展理论找不到必要的发展手段，因为寻它羞于作价值判断，从而无法告诉人们什么是值得追求的，值得付出代价去换取的。实际上，任何一种政治发展手段都是不完善的，都是会产生副作用的。更为尴尬的是，它还使得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无法真正认识自己的理论价值何在。这就使它在鼓吹这种价值时总不免吞吞吐吐，陷于理不直，气不壮的困境。

§ 17 理论体系松散

从第二章的介绍中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结构体系并不完整统一，本文的介绍只是按照各位重要的政治发展理论家分别在各项领域中的论述加以排列介绍的。七大块之间必然的逻辑联系不甚密切。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位理论家能够同时兼长这七个方面的理论并从逻辑上把它们联成一体。

1. 定义纷杂，模式空洞

美国发展理论家瓦尔马 (Caidga Nath Varma) 在他的《发展的社会学与政治学》(The Sociology and Poiltics of Development—a Theoretical Study) 一书中报怨发展理论中“定义”太多，而命题探索方面的著作又寥寥无几。他指责派伊有关“过渡性”政治模式的命题“过于抽象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证实假设的论据”¹¹⁾。实际上，派伊由于对区域问题和文化问题的高度重视，他在下定义引用概念和构筑模式方面并不十分追求，至少比另外几位发展理论家，阿尔蒙德、亨廷顿、李普塞特和多伊奇等比较要“逊色”一些。派伊尚且受到这种指责，整个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的这种弊病就可想而知了。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有贪大求全的毛病，喜欢编写教科书，满足于使“理论”看上去在方法论和概念术语上新颖美观，在模式公式上流畅圆滑，而不顾它在实践中的具体情况。瓦尔马指责他们“敢于做他们力所不及的事情”¹²⁾，“使理论成

11) 周忠德等编译《现代化问题探索》第39页。

12) 上书，第36页。

为方法论的陪衬”¹³⁾。

2. 体系抽象，不切实际

这是当代西方政治学的通病，其病根很大程度上在于科学主义对政治学的侵蚀，对价值的祛除和对所谓理论“中立”的苛求。以阿尔蒙德备受称赞的名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¹⁴⁾为例，这本书严格说来只能算是教科书而不能算是理论专著，因为它给人以比较零乱的知识而非智慧和启发。¹⁵⁾这是一本标准的用结构和框架去套实践和事实的作品，它以概念如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政治交流、政治结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决策、政府结构与功能、政治体系行为、政策结果与反馈、政治发展、政治产品与生产力等14个项量为经线，以体系、过程、政策与发展4个项量为纬线，筑构起一个虚设的理论框架，然后再把各种实际存在的政治现象，事实和知识填塞进由这经纬二线划定的一个个空格子。

且不说十四条经线，四条（或更多）纬线的确定是否科学合理，它们相互之间是否存在什么必然联系，为什么只能是这几根，这几条而不能是别的等等，单就政治世界的复杂性，政治现象的纷纭性而言，这样把政治事实削足适履地塞进理论框架中去的做法就是有欠高明的了。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并不能说是理论家的错误，甚至也不是他的理论的错误，而是我们从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实践出发来要求它时产生的一种失望的感受。我们发现政治发展理论与我们的实际要求之间有差距，能切中我们实质的见解不多。在当代西方，在美国的学术与思想背景上只能产生这种与我们要求不尽合拍的理论。

因此，对于我们今天的特殊要求来说，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之类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著作都不成其为“理论专著”，而只能算是向学生传授政治发展知识的教科书。在这种教科书式的理论专著中，我们所需求的“体系”是找不到的。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在整个政治学，整个社会科学中都是如此。教科书中的体系大都是松散抽象，为体系而体系的。

13) 周忠德等编译《现代化问题探索》第56页。

14) 这本书的前身《比较政治学：发展途径》(Comparative Politics Developing Approach)在体例上与经过大幅度修订的这一版有很大的区别，参见这本书的序。在我看来修订本的学术味和经院气增加了而理论性却下降了。

15) 知识与智慧的区别，智慧教人以物理、事理以使人触类旁通的穿透事物表面现象的洞察力；知识则只是对事物，事实的客观描述。

3. 缺乏基本的分析单元

缺乏基本的、内在统一的分析单元，这是政治发展理论无能构造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伯恩斯 (E. M. Burns) 说过这样一句话：“政治学说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拥有复杂的渊源和多方面的意义，要求它削足适履地适合于一个统一的解释，似乎是不那么合乎逻辑的。”¹⁶⁾ 伯恩斯这段话主要是用来责备政治学中大卫·伊斯顿的体系学派和达尔的分析学派的。后来的政治发展理论似乎并没有听从伯恩斯的这一训戒，一直在走伊斯顿和达尔的老路，试图强行建立一套政治发展的理论体系。然而可悲的是，伊斯顿和达尔的确是建立起了一定的体系的，不管他们的体系是何等地空虚和抽象，而政治发展理论的诸大师并没有达成此等成功。伊斯顿、达尔的“影响力”那样性质单一的基本的分析单元在政治发展理论中是无从找到的，而没有这种基本的分析单元，一个理论就只可能是由多源流的、层次不齐的知识拼凑起来的理论“杂拌”，而绝对不可能具有一个结构严密宏伟的体系。本文介绍的政治发展理论的七个方面，没有其中任何一个可以作为全部其它方面的前提和基础，不能说从其中一个可以推出另一个，因为它们全都是同一层次的，互相交错牵联着的。说穿了，它们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发展理论中的组成部分，而是用来观察这个理论的七个不同视角。

4. 借鉴与引用的失当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大量借鉴了其它学科的成果，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由于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内容的决定，它的这种借鉴难免有贪大求全，机械生硬之虞。如果把借来的、还没有很好地融合为一体的各种概念，结论和推理抽掉的话，剩下来真正属于政治发展理论自己的东西就微乎其微了。这一现象可以作为政治发展理论还不够成熟，还处于发轫开端的草创时期的证明。

除去生吞活剥带来的消化不良症以外，这种借鉴的失当给政治发展理论还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只管介绍引用，只问拿来，而不顾消化以为已有，这就使得政治发展理论纠缠于概念、定义和方法论之中脱不开身，使理论本身淹没在零乱的概念、定义中。这种喧宾夺主的做法正是我在前文中指出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几项理论缺陷的导因之一，它使理论对价值问题的关注仍不够多，更缺乏有关政治发展的一般进化意义¹⁷⁾的说明。

16) 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第513页。

17) 参见第三章注(4)。

§ 18 对发展现实认识不足

1. 不同的政治体系有不同的政治发展

在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政治发展从形式到内容，从现象到本质都是颇有不同的。一般说来，对发达国家而言，政治发展是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政治后果来考察的；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过渡性的政治体系而言，政治发展则是作为一个功能过程和结构的生成过程来考察的。作为后果来考察政治发展，基本上是一种历史范畴，也比较易于做出全面的总结分析和深入细致的判断推理；但作为过程来考察的政治发展则是一种对未来的规划和对偶然性的主观把握，是很难做到历史学的那样服帖合理的。换句话说，所谓历史的，后果的考察在今天的政治发展理论中大体上导致了比较令人满意，令人振奋的那一部分的考察，而忽视了这段历史中的各种曲折、崎岖、挫折和困苦。过程的、规划的考察则专注于现实中的问题，急待解决的、令人难堪的问题。因此，这两种考察是不平衡的，对被考察的对象来说也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不仅如此，这两种政治发展在动力机制上也有很大的不同。作为后果考察的政治发展一般被看作是一种自然生长和生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力量的发挥是比较自然的、均衡的；而作为过程考察的政治发展则被看作是一种畸形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可能消灭其他可能的过程。的确，正如我在第16节中所指出的，时至今日，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后发人为的，被启发被推动进行的过程，发展的动力日益来自发展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发展动力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到外界影响的，是受到来自内、外部双重压力作用。如已发展国家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文化福利上的“示范效应”。

2. 发展道路的唯一性

由于具有上述的这种不同性质，有“示范效应”和“双重压力”从而使得政治发展在已发展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所走的道路与结果也将有所不同。严格说来，特定政治体系的政治发展道路是特定的，唯一的和不可仿效的。

由于来自内外部双重压力的共同作用，正在进行之中的政治发展总是不如只受单一压力的政治发展那么来得自然而然，有目标有前提的发展总是倾向于激进热切，期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即赶上已发展国家；由于“示范效应”的影响，给人们的希望就多，而失望也几乎同样多。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将是曲折、坎坷的；时时会有动荡和危机出现。这段路程如果走得好，就有可能非常迅速，

短捷；但若走不好，也会非常漫长，黑暗。并且，无论如何，由于原来出发点的不同，其间所走过的道路的不同，最后所得到的发展结果也将会有所不同，历史上看上去经常会重演，但演出完毕，人们会发现重演的是另一出戏。

3. 发展的客观条件的不同

毫无疑问，过渡政治与发达政治体系在发展之初时的那种政治在形态上走不尽相同的。它们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及，但也有可能在另外一些地方胜过已发展政治当初的情形。一般说来，这其中最大的不同条件在于，发展中的政治在发展前提下往往都会有一个模范榜样存在，有一个向往的既定目标在前面召唤它，而已发展的政治则无此。这一点，我们看到，不仅在发达和发展中政治之间有所不同，即使在已发达的各东西方政治中也是不尽相同的。欧美、日本和苏联即分属三种不同类型的发展。至于具体的不同条件，不仅存在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文化心理和政治体制结构上，而且存在于某些更为深层的，但同样对政治发展是有决定作用的因素之中，如经济、宗教和各种物质条件。

4. 发展观的不同

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如现在的大多数西方与东方国家之间，它们的政治发展观基本上是有着根本的差别的，西方的积极，进取，追求主动；东方则相对较为消极，退避，处于保守被动的立场。这一点本文第一章既已指出。这种大范围的、整体的、全局性的不同也必将会影响到东西方国家选择政治发展方向和道路的不同。这是不成问题的，就象一个主观上努力，一个主观上懒惰的人，他们在学业事业上的造诣成就会有所不同一样。更进一步，我们看到，政治发展观，即对政治发展所采取的主观心理态度的不同实际上也存在于同一政治体系之中。我们说一个政治体系持何种政治发展观实际上是指在这个政治体系中的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何种政治发展观，而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持同一政治发展观。

导致同一政治体系内有不同的政治发展观的存在的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个政治体系内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过程没有彻底完成，因而这以传统的，过渡的政治体系为甚。过渡社会中的人们在价值观上会产生很大的差异，在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之间的分化和分裂现象非常巨大，既有极传统，极保守，极落后的，也有非常现代化的，进取的和先进的。政治发展必须同时满足这不同层次的政治发展观和价值取向。毫无疑问，过渡政治的发展在对待这一与发达政治的发展截然不同的情

况上耗力甚巨。一个国家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则它的政治发展就根本谈不上。

第五章 结论

§ 19 对待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主体态度

由前文可以看出，笔者明显地是把对政治发展理论的诘难和批评放在本文的首要位置上的。实际上，对于政治发展理论无论是完全肯定或彻底否定都是不科学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还只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按照西方学术的标准，现阶段的政治发展理论还只不过属于一种由一批涵义不甚确切的概念和假设性命题机械地拼凑起来的初级理论，它还有待于升华到那种概念明确、命题可靠、体系严谨的一般理论的水平。

但是，话又说回来，由于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的特殊，政治发展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视角供我们去观察，我们目前正处在变革（这也正是一种比较特殊意义上的发展）之中的政治，它启发我们把政治改革放在一个更广泛的、更广阔的动态背景中去考察。带着这一用意去了解认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我们有必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中肯公允地评价政治发展理论

政治发展理论从发展变化的动态观点来考察分析政治现象。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政治分析方法。但若要很好地借鉴政治发展理论，首先就应该透彻地了解它的性质特点，内容范围，形式方法，了解它的优点和缺点。在我们今天的情况下，我们从正面介绍政治发展理论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个较为良好的开端，接下去除了正面介绍的工作外，还应从负面对它进行介绍，即分析它的缺陷。只有如此，我们的介绍工作也才能不至于发生偏颇。此外，还应在介绍的同时把它跟我们国家民族固有的有关政治变迁的理论加以比较，对照。只有与我们国家的实际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我们的分析工作才能深入下去。

2. 批判其“西方中心论”倾向

前文业已指出，“西方中心论”的倾向在政治发展理论中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种弊病主要地并非是由政治发展理论家们个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

恰恰相反,许多人主观上都还是努力要避免这一点的。但是,从我们的角度出发,必须坚决摒弃这种错误倾向,只有这样,这一理论才可能更有效地为我所用,也才可能真正体现出它应有的科学性。

“西方中心论”倾向说到底是由各种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是特定的文化心理和狭窄的视角,有限的材料使之必然产生的。但只要换成比较健全的心理,全方位的人类文化,开阔的视角和全面的材料,这种不良倾向是可以纠正的。极端说来,纠正之法当在于辅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以“东方中心论”倾向。

3. 吸收西方的政治发展观

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所体现的政治发展观是从西方世界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确立起来的政治价值观一脉相承而来的。迄今为止,它在总体上仍然是一种积极主动、向上进取、追求理想和理性的政治价值观。这种政治发展观在很大意义上说是我们东方各国所不具备的。因此,吸收这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治发展观以改造我们传统固有的不健康的政治价值观是很有必要的。

4. 突破政治发展理论现有的松散体系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是一个庞大而又杂乱的体系,由于学科起步晚,历史短,也更由于一些客观的现实条件,如它所研究的领域范围之广阔,所要解决的问题之杂乱等等,它的内部迄今尚无多少统一性可言。因此,要吸取它的合理性以为中国的政治改革之用,这就有必要突破它现有的体系,或者说给予它一个崭新的统一的体系。这里,首要的是必须摒弃它在价值方面的种种禁忌,以及与此相联的西方中心论的观点。

5. 从整体上把握政治发展理论和当代西方政治学

政治发展理论是西方政治学的一个分支,由于剧烈的学科分化和综合(intersubjective intergration),西方政治科学在疆界领域上是扩大了。但另一方面,在内涵上却被日削月割,日益缩小了。政治学的许多传统研究课题现在都不为政治学家们所重视,而反被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由此看来,我们今天应该综合地、整体地对待西方的政治科学和全部社会科学。政治发展理论中有许多在我们看来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不应该不大书特书的。但由于它们有其它学科在研究着,并且已有非常深刻的见解和肯定的考察,是久

已为西方人所熟知的，所以政治发展理论似乎也就没有必要再赘言了。我们了解政治发展理论，不能把目光只局限于理论本身这一小小的范围。

§ 20 中国传统的政治发展观

我用“政治发展观”这一概念代指人们在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观念等方面对政治的发展变化和变迁所持的主观心理态度。其中最主要的是态度的积极、消极、主动、被动、激进或保守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发展观与政治文化是一个东西，但它是政治文化中最为现实，也最为有力于政治体系活动的方面。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它应该说是一个比较主观的，唯心的东西。我们要研究它就必须研究大量的历史和文化现象，包括古代经典，习俗和社会结构等等。但严格地说，这些都是“文化”，但并不是“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并不存在于这种种死物之中，而存在于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的心中。在这种前提下，政治发展观是可以取代政治文化这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而成为我们分析政治现象中的最重要的部分的。¹⁸⁾

毫无疑问，一个国家民族特定的政治发展观是由它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各方面因素共同决定形成的。而一旦这种政治发展观确立以后，它又会对该国该族的政治发展起到巨大的决定性作用。本文第三章曾指出西方的政治发展观是一种较为进步的发展观。其原因主要在于它提倡政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鼓吹对分化，复杂化，世俗化和理想化的追求。主张应该主动地适应和变革政治环境，参与更大范围内的政治竞争。应该说在这方面，西方的政治发展观是卓有成效的，达到了它所鼓吹的目的的。

中国传统的政治发展观不如西方的那样具有比较整齐和统一的性质，旗帜鲜明，令人一看即知。由于我们的历史悠久，政治思想的成熟时期到来得较早，其后又一直处在变动不居之中，所以我们传统的政治发展观就很难把握。单纯钻研“四书五经”而不去接触此后几千年的政治变革史，我们就无法确认我们的政治文化，也无法得知我们的政治发展观。

一般说来，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即儒家政治思想是积极入世的、实用的和人性的。它也是构成中国古典政治价值观的主要成份。但是近代以

18) 这也许只是一种比较极端的说法，它主要是针对目前我们政治文化研究中过重历史考据而轻现实政治分析这一弊病而言的。

来,这种基本上是儒家政治价值观居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政治发展观发生了巨大的动摇。本来,西方文化的东渐应该是给中国传统政治精神带来新鲜血液的。但是,一方面,东来的西方文化是一个与我们传统文化有着同等量级和深度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我们的传统文化又恰好处在一个时运不济的阶段,已经变得非常僵死教条了。所以,近代以来我们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处在解体和崩溃之中的,作为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它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同时,西方的价值观也并没有很好地系统地吸收进来。

在这种前提下,我认为,我们目前的政治发展观同样也是一个非统一体。两种同样比较积极入世,讲求实用济世精神的文化价值体系的碰撞,两败俱伤。从而使一些原来居于次要的,潜层地位的价值观有所抬头,出现在表层。当然,这种不那么积极的价值观现在很难再用道家或佛家来概括¹⁹⁾,它作为一种价值观也许并没有形成新的体系,但它表现在我们今天的政治发展观中已经非常明显。我们政治改革上的许多阻力不能不说即来源于这种发展观带来的消极悲观的精神状态。改造传统文化首先就应该从改造这种有害的价值观入手。

§ 21 中西政治发展观互相借鉴的可能性

要消除目前我们政治发展观中前述的那种不良成份,既不能单纯从生搬硬套西方的发展观入手,更不能从恢复我们的古典儒家政治发展观入手。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促进中西政治发展观的互相借鉴,使二者相互涵化,融合,最后形成一种新型的混合性政治发展观。

从我们固有的发展观看,吸收借鉴西方政治发展观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政治改革运动实际上也正是一场大规模、高水平的政治发展运动。这种政治发展运动为我们吸收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和现实基础,它呼唤一种崭新的,既不同于西方的,也有异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发展观。其次,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还是一个不很成熟的理论,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完善,系统合理化。西方的文化背景并不具备使它自动成熟的条件,而这种客观条件在文化背景迥异的东方是具备的。在我们看来,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缺陷非常明显,我们正可以通过批评它的缺陷

19) 就是说,发生嬗变的是一个整体性的价值观,不应说是儒家落败了,道释上升了,而应说儒家政治观本身也同时发生了这种衰败,变得不那么积极上进了。

来吸收改进它，这比单纯的直接拿来也许更有效一些。

更进一步，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如果不能超越它原有的思考环境，不突破它的传统背景都不可能是真正科学合理的。从整个世界的范围，从全人类政治发展的进程看，东西方的政治发展都有待于进一步修正完善。但这种改造若是局限在各自特定的背景之下都不会有太大的成效。而建立起一种普遍适用的政治发展理论则更是不可能的。就中国的政治现实而论，无论是要建立这样一种普适的超文化与超价值体系的政治发展理论也好，抑或只是要对我们传统的政治发展观进行改造修葺也好，都有必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注重发挥中国传统政治发展观的长处，克服它的弱点

我国传统的政治学说实际上是一种伦理政治学，在今天，这种伦理政治学已经以其内含丰富的实用济世政治价值观而博得了世界范围的重视。它被人们认为是包含了很大的普遍意义和现代精神的。而从我们自己这方面来说，我们民族传统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正处于帮助支持起我们这个古老强盛文明的伦理政治观。它的实用、积极、入世的政治发展观，我们今天弘扬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不可以丢掉这个方面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政治学应具有领先和带头作用。

2. 重视一种具有科学启蒙意义的新民族主义

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意欲从主观上去重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和特殊性，但他们的主观努力由于缺乏最后的落脚点而不免流于形式和口号。应该说，民族主义是一个比较优良的落脚点，是可资作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动力前提和生长基础的；政治发展的逻辑是一个动力刺激和行动的过程，它首先必须调动起它赖以进行这种发展所必需的各种动力因素，其次必须保证这种动力因素不至于因外损内耗而流失衰竭，从而能够有效地发挥出来。对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是必然以多种方式存在的，不成为政治发展的动力就成为它的阻力。因此，用理性精神和现代意识去改造它，使之具有一种科学启蒙意义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应该说是很有必要的。

3. 重视心理发展和心理改造

确立一种具有科学启蒙性质的民族主义以实现政治发展中“压力阻力→动力”的机制转换。要完成这任务就必须进行心理研究和心理改造。首先是个人的心理，

所谓“在提出一种可行的政治发展理论之前，至少对个人发展理论的研究要有个开端。”²⁰⁾因为，个人是政治体系中最基本的也是最坚实的基础，一切最终都要落在个人身上，而且这种倾向在近代以来越显得切了。个人在政治发展中的感觉、感触和感受，由此而生的对政治发展所抱的心理态度和美学观念，个人的参与、支持、中立和反对、抵制的态度，他对发展的要求等等，这些都是政治发展动力机制最根本的组成部分。其次，是集团—社会—民族的政治心理，这是政治体系的精神基础，所谓国民性，民族精神等等都源于此。应该说，从学术研究应有的精确性和科学性方面而言，这个比较抽象一些的心理层次比个人的心理更为重要，因为它比个人层次更直接作用于政治体系，它是直接决定政治体系活动的行为模式的因素。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心理建设”即是我国先贤们重视心理发展和心理改造的先例之一。

总的来说，心理研究和心理改造有两个要点：一是研究的层次在从价值观上重视个人层次的同时又必须上升到社会层次。二是心理的历史研究有待于落实到现状研究上，这就是从目前对死文化的研究转到对现在生活中的人的心理的研究。前一点要求我们不拘泥于具体琐碎的个人人格心理机制，而能从更高的角度出发，把握对政治发展具有直接决定意义的民族政治心理，价值观和发展观的特征。后者要求避免过份依赖历史和典籍的研究方式，而能从比较实际地考察政治现实出发，用对政治现实和现状的心理研究取而代之。这些首先要求我们去说明我们的现状，什么是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能够追求的，值得追求的。因为也只有这些切切实实的存在，才是最后决定我们政治发展的价值，目标，手段和道路的因素。

§ 22 尾语

以上，本文特别介绍了当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况，分析了它的得与失，特别是把它的失作为本文分析部分的重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否定大于肯定。之所以作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是为了弥补目前国内介绍的缺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本文的另一大旨趣，即借鉴西方政治发展观以改善和发展我们民族固有的政治发展观和发展理论。

东西方的政治理论对人类政治发展问题都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实在说来，它们无不都是局限于各自狭窄的环境之中做出这种贡献的。谈论东西方政治发展

20) 古尔德等主编《现代政治思想》第189页。

观的得与失，批评它们的缺陷与贫乏，这并不等于就否定了人类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而是说无论东西方的理论都还没能很好地揭示和解释这个规律。这是一个超出东西方已有政治发展历史的更高的规律。这需要做出更好的揭示和解释。若不摆脱我们现在的这种烦琐，经院的研究方法和偏狭的发展观是不大可能的。

其实，繁琐复杂的政治发展理论是可以大大地简化的，更高的规律应该是简单明晰、朴实无华的。

单就一个意欲进步的民族国家而言，发展的原理不外乎两句话：一是发展必须努力奋斗，付出代价。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惰性、懒散和保守迂滞对于生活来说正好意味着幸福，闲暇和舒适；而努力奋斗则意味着牺牲、艰难和辛劳，发展是必须有代价的。二是，发展是一种政治体系系统适应环境的存在现象，因此努力也会有有效与无效之分。并非一切劳动都产生相应的结果，这一点与普通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并无二致。发展的价值并不仅只在于内部的“消费”，即政治体系对特定政治背景环境的适应，而且还在于它走一种“比较”的和“交换”的价值。²¹⁾所以政治发展必须追求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进化，必须把自己特定的发展与人类共同的发展方向协调起来，因为在当今世界上，任何政治体系都不得不把自己特定的发展成果推广到全世界范围中去，参加“展览”，进行“比较”和“交换”，取得别人，别国和别的民族的承认。

这里，第一句话表明了发展的艰巨性与历时性，因此发展必须实实在在，来不得半点投机和取巧；第二句则表明了发展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它昭示我们要发展就不能不“投机取巧”，不能不运用一切技术和机巧来最大可能地使我们的奋斗努力成为富有成效的劳动，从而把发展的压力刺激最大可能地变成动力刺激，使政治发展变得既平稳又高速。凡此种种，都有待于我们在实践和理论上作进一步深入细致的探索。

21) 政治发展的成果必须在跟别国别族政治发展的成果进行对比方显它的有效性。过份专化的政治发展只能给政治体系带来相对于更大环境的停滞性，因为它的成果有背于世界潮流，不为国际标准所承认。

附录 I 对派伊关于过渡政治过程17项特征的分析

	美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印度	苏联	日本	朝鲜	中国	沙特
A	3	5	5	6	7	6	10	8	10	10
B	4	6	6	6	7	10	9	8	10	10
C	3	6	7	3	8	6	10	8	8	5
D	3	5	4	3	8	8	9	10	10	10
E	3	3	3	7	6	3	5	10	3	2
F	1	1	2	3	6	6	3	6	5	10
G	2	4	4	4	6	6	9	9	10	6
H	4	5	6	5	7	8	8	8	9	8
I	5	5	6	6	7	6	7	10	6	9
J	4	5	6	5	8	9	9	4	9	6
K	1	4	5	2	5	6	9	10	10	10
L	2	3	2	2	8	10	7	8	10	10
M	6	3	3	3	7	8	5	9	10	10
N	5	6	5	4	5	7	5	2	7	9
O	3	3	4	3	7	7	4	6	7	9
P	5	6	6	5	6	8	7	5	9	9
Q	3	4	5	3	7	9	8	9	10	10
总计	54	72	74	80	113	122	122	131	143	146

上表反应了对世界上具有代表性的十二个国家和地区17项特征的赋值情况。表中，纵向的阿拉伯字母依次代指派伊的17项特征（按本文第二章“过渡政治”一节中的顺序）。

统计的结果：美国54，英国72，法国74，西德80，意大利80，印度113，苏联122，日本122，雨朝鲜131，中国143，沙特146。另外，西欧平均76.5. 东亚平均132。

分析：

1.17项特征对欧美各国之间的情况反映得比较准确，基本上符合普遍认可的对欧美评估的标准，即美国最不是过渡政治，英·法·西德和意大利则依次逊于美国。

2. 对西方以外国家情况的反映极差，如印度的非过渡性大大超过中国和南朝鲜，甚至也超过日本和苏联。
3. 政治越强大，即组织越严密、结构越独立、意识形态越高张，则政治的过渡性也越强。如苏、中的落后于印度。
4. 无论实质内容如何，只要文化方面比较接近西方，或只要在形式上采取了西方的民主体制，则这种政治就是现代化的了，如印度。
5. 17项特征反应特定文化类型以内的，或特定政治意识形态以内的政治体系的情况一般准确性相仿，如表中反应的非过渡性在欧美各国之间的顺序排列以及在东亚各国中的顺序排列。
6. 印度政治过程的过渡性（113）正好在西欧（76.5）与东亚（132）之间。
7. 政治发达程度与经济发达，国力强弱水平无关，如日本和印度分数上的颠倒（222：113），苏联和印度分数上的颠倒（122：113）。

结论：

不难看出，以上各项分析表明，除了第1项地较合理以外，其余一律不甚合于当今普遍认可的评判标准。之所以会如此，本文认为正是由于派伊在其理论中自觉不自觉地带上了文化偏见即“西方中心论”倾向。

由于囿于文化偏见，派伊推崇西方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形式，因此才出现了把在文化（价值）和政治的表面形式上比东亚儒家文化更接近于西方的印度捧为政治上较少过渡性的国家，也即政治较为现代化的国家这样的现象。

由于囿于文化偏见，在派伊的17项特征中，政治本身的特征被置于不顾，真正具有发达的政治组织、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国家，如苏、中、日等才统统被抛进了过渡政治的行列。这就必然导致一种非政治的政治分析，即政治发展不以政治本身的发展为依据和衡量标准，而以文化发展为准。

因此，可以准确地说是，17项特征不是政治的，而是文化的。用它们来进行政治分析将导致失误和偏差的出现。